

南大智库文丛
李刚主编



The 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思想的掮客

智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

[美] 詹姆斯·艾伦·史密斯 著

李刚 邹婧雅 赖雅兰 孔祥越 等译

James Allen Smith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大智库文丛
李刚主编

思想的掮客

智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

[美] 詹姆斯·艾伦·史密斯 著

李刚 邹婧雅 赖雅兰 孔祥越 等译

James Allen Smith

The 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掇客：智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 / (美) 詹姆斯·艾伦·史密斯著；李刚等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
(南大智库文丛 / 李刚主编)
ISBN 978-7-305-17910-5

I. ①思… II. ①詹… ②李… III. ①社会政策—研究 IV. ①C9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1807 号

THE 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By James Allen Smith

Copyright © 199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MAN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6—35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大智库文丛
主 编 李 刚
书 名 思想的掇客：智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
著 者 [美]詹姆斯·艾伦·史密斯
译 者 李 刚 邹婧雅 赖雅兰 孔祥越 等
责任编辑 崔智博 张 静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26.5 字数 381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7910-5
定 价 79.8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大学与智库”

——“南大智库文丛”总序

中世纪的大学是学者的行会，传道授业是最基本的使命，也是教授们谋生的手段。柏林大学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先河，成为现代大学的原型，但是由于曲高和寡，它被人们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二战”以来，美国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着眼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把服务社会列为大学的第三个基本功能。

智库作为现代社会从事战略和政策研究、咨询的专业机构，是现代政治运作、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综合需求的产物，是知识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的产物。大学不同于智库，这是一个常识。一般而言，大学的历史要比智库悠久得多，大学的体量要比智库大得多，大学的结构和功能要比智库复杂得多。大学和智库的关系本来并不复杂，但是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有学者惊呼“高校就是高校，不能把高校建成智库”，一时间大学和智库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很有必要对大学和智库的关系做系统的讨论。



在现代社会中，大学和智库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机构。虽然大学不是智库，但是大学和智库之间关系非常密切，甚至有时密切到难以分割。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单元，学科建设是大学的重中之重。对于智库而言，政策问题是基本单元。当然学科取向和智库的问题导向研究本不应该对立。学科是基础，智库是学科体系的应用。有人认为，没有长期的知识积累，高校智库就对现实的国计民生问题指手画脚，这种行为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一种知识的不诚实。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对于当下的许多智库而言，这是非常及时的提醒。中国古代“士”阶层有强烈的济世情怀，有指

点江山的豪情壮志。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被看成最风流潇洒的事业。这种古代智囊的遗风很容易被当代智库继承,所以当代中国智库需要警惕的是浸染古代智囊不调查不研究、信口开河的不良风气。现代智库强调循证分析是现代科学精神的体现,是某一领域长期知识积累后的发现,提出的政策建议出于“知识的诚实”。

学科发展促进智库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出现在美国。1957年苏联率先成功发射卫星,这对美国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也让美国全面反思自己的教育体系。1958年美国颁布了《国防教育法》,该法案要求大力推动科学、工程和外国地区研究,并为这些学科提供巨额经费支持。此后美国的地区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对中国的研究也得益于《国防教育法》。在费正清的倡导下,美国的“中国学”学科渐成气候,西方传统汉学没落,着力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国学”学科成为主流。在“中国学”学科范式的熏陶下,一代又一代学人不仅占据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国研究院系的教席,而且“中国学”也成为智库中“中国问题政策分析”的主流范式。2007年,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指出:“几乎所有华盛顿区域的智库都有一人或者多人全职或者半职专门研究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他列举了30位工作于智库的“中国学”研究专家,这些专家在他看来都是可以 and 大学教授平起平坐的专家。他说:“正是这些在学术机构和智库的研究人员共同催生并推动了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这一领域的形成和发展。”

美国智库史专家詹姆斯·史密斯在《思想的掇客》里把智库专家分为六类,第二类专家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政策领域进行长期研究的人。他认为,“这些人可以称作‘政策专家’,这个领域的学者通常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政策研究或者教学而不是政策制定和担任全职顾问上。无论是通过融入政策的理论洞见,还是培养继续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学生,他们的工作或许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些人一般工作于大学的研究中心”。我们认为,这类政策专家从事的是“学科”层面的工作,他们的使命是为智库的实务生产概念,准备理论,锻造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及其分析范式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概念为智库分析国家综合国力提供了崭新的超越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波特提出的

竞争战略分析框架被许多战略研究智库用来分析国家竞争力。这都是学科突破促进政策分析的经典案例。这也解释了为何一流智库专家大多出身一流大学的社会科学学科。因此,越是一流的政策学科,越是一流的政策专家,越是能够促进智库的分析和咨询能力。

大学也是智库人才的摇篮。智库的人才从哪里来?全部靠自己培养吗?世界上的智库除了兰德公司有自己专门培养政策分析师的研究生院外,恐怕没有其他智库自己培养智库人才。当然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等中国智库也培养研究生,但是他们的研究生大部分都不是针对公共政策研究需要的,和兰德还是有区别。那么,智库的人才显然主要来自大学。据调查,美国著名大学社会科学类的研究生中45%首选到咨询公司和智库工作,特别是政治学(美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属于政治学,这和中国不一样)研究生把到华盛顿著名智库实习和工作当作未来从政的南山捷径。

中外许多著名大学的社会科学学科都很强,到智库中从事政策分析工作显然是大学社会科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的一个重要出路。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一直是所谓的“学科建设取向”,对大学而言,衡量一流学科的指标是核心期刊论文、专著、项目、博士点的数量。至于培养出来的学生能不能为智库所用,是不是智库所需要的,这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事情。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中国大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大纲,不难发现,没有多少课程是专门为智库等政策分析部门服务的。令人忧思的是当代中国大学严重忽视了为智库提供优秀的战略研究和政策分析人才的任务。

二

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批示,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目标。2014年10月27日,《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交“深改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习近平总书记就智库建设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2015

年1月20日,中央“两办”正式印发《意见》,揭开了新型智库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大学不会也不可能置身于这场新型智库建设的浪潮之外。的确,大学不是智库,但是大学可以培育智库,而且能够培育出很好的智库。发挥智库作用是哲学社会科学几大功能定位之一,而新型智库则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机构。大学既不能混淆学科与智库的区别,也不能割裂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必须形成学科建设和新型智库建设螺旋发展、良性互动的新格局。学科是大学教学、研究和知识分类的基本建制,迄今为止仍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西方大学里培育优秀智库的案例并不少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本身就是培养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著名机构,该学院下属的贝尔夫中心等机构都是美国顶级的智库。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也是顶级的智库。近几年我国大学里也培育出了若干个著名智库,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重阳研究院、复旦大学的发展研究院、中山大学的粤港澳研究院等。

但是大学办智库也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大学对培育学术型研究中心的经验和模式有路径依赖,因此很容易用建设学术型研究中心的思路来培育智库。大学学术型研究中心与智库的最大区别是研究中心关心的是教学和研究,研究成果的主要去向是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和学术出版社;而智库关心的是通过研究、咨询和传播活动影响政策共同体或者影响公众舆论,对于智库而言,大部分研究项目从启动之日就明确目标受众。当然自由研究在智库中不是没有。据华盛顿发展绩效研究所前董事长大卫介绍,他们研究所鼓励员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做不带任务的自由探究。布鲁金斯学会也给予资深研究员自主选择课题的自由。但是智库的自由研究不可能离开智库的“大盘子”,如丸走坂,自由选择是受限制的。

大学培育智库时,往往受建设研究中心的惯性思维影响。因此,虽然当下我国许多大学的研究中心和研究基地在向智库转型,但是转型成功者不多。重中之重是观念认识不到位:对智库本质认识不到位,对智库运行模式认识不到位,对智库产品设计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对智库传播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

大学研究中心产出相对单一,而智库的产品(productions)则包含研究报告(表现

为各种出版物)、咨询服务、活动(智库主办的各种会议、论坛、听证、调研等,本质上是智库利用自己的专家、场地和品牌提供的服务)。据盘古智库易鹏理事长介绍,盘古一年的活动是150场。2015年布鲁金斯学会举办了292场活动,2万多人参加;举办了110场在线讨论,有5.9万人参加。恐怕我们任何一家大学的研究中心都不可能办这么多活动。如果智库局限于研究工作,以研究报告为主要产品,那么,这种智库和大学研究中心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大部分智库都是此类性质,因此很难称其为“智库”,这是典型的“智有余而库不足”。

大学研究中心、研究基地向智库转型的困难之二是缺乏熟悉智库业务的营运人才,尤其缺乏“政策企业家”。大学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长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长于思考与写作,但是运营能力严重不足,办事、办文、办会都非其所长。一旦让教授们运营智库,如何处理好与政府、媒体、客户之间的关系,如何从事智库内部的管理,这些对他们而言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教授运营智库会存在很长的不适应期。

例如,电视普及后,智库专家主要承担“政策解读”角色。而现代媒体已经从狭隘的政治报道转向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分析,这种趋势之上不仅需要更专业、拥有更好教育背景的记者,同时也更倚重专家的力量。现在这些公共专家与记者、编辑已经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他们在报纸专栏、广播新闻项目以及从电视衍生出来的访谈节目中找到了机会。报纸和电视新闻记者依靠这些专家来使每天的新闻报道更具深度,体现多样性并实现观点上的平衡。实际上,寻求争论本身就已经扩大了讨论的范围,将这些专家带到了聚光灯之下,他们作为权威人士对各种社会热点做出评论。这种角色对于习惯于象牙塔的教授们而言并非易事。

一个成功的智库领袖往往都是“政策企业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机构建设。他们调用资源来推进一个特定议程的实现,或者是促成不同研究者和行动者之间的联合,提高他们的职业能力,或是将可造之材送入政策精英团队之中。他们往往领导一个强大高效的营运团队,把智库的一切都安排得有条有理。据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张怡副院长介绍,复旦发展研究院有一支由20余名国内外知名大学硕士组成的营运

团队,正是团队的高效运作才使得复旦发展研究院能够整合整个复旦的社会科学专家资源。南京大学的紫金传媒智库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包括秘书长闵学勤教授在内的5人专职、10余位硕士生兼职的营运团队,这个营运团队一年中完成的活动已经有30余场,其中包括很多大型活动。

大学培育智库的第三个障碍是人才评价体系。为了满足学科建设取向的需要,尤其是当下“双一流”的建设热潮,大学对事关学科发展的指标非常重视,甚至不惜推倒对教授的长聘制度,全部教员纳入合同制管理,三年一个周期进行考核。对于许多还没有晋升到教授岗的教师而言,高层次的项目、一流期刊论文、高级别奖项和各种人才奖励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大部分智库性成果并不是晋升教授的依据。

总而言之,大学想培育出优秀,甚至世界一流智库的道路是曲折迂回、遍布荆棘的。但是大学是不是就应该放弃培育智库?非也。大学发挥智库功能是大学服务社会、服务政治的需要,尤其是著名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很强,是国之重器,培育优秀智库是大学的义务,也是大学的责任。大学教授从象牙塔旋转到智库,经过智库的洗礼再回到研究机构,视角和体会都会不同,教学和研究都会变得更接地气。

三

八十四年前,罗家伦在出任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之一)校长的就职演说中,以“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来定位学校的使命。时光荏苒,南京大学虽几经变革,但与时代、与民族同命运共呼吸的追求始终未变,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瞄准世界一流、追求卓越的思维始终未变。

南京大学在中国智库史上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胡福明同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今天看来,这也是大学和媒体发挥智库功能的一个经典案例。十余年前南京大学提出了研究型大学“顶天立地”的发展战略:一方面确立重点学科发展战略,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科研成果;一方面融入国

家地方创新体系,着力提升一流社会服务水平。在“顶天立地”战略的指引下,南京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通过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在不断提升研究层次和质量的同时,充分发挥哲学与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大多位于我国前列,实力雄厚,南大认为这种优势地位不仅不应该削弱,反而应该进一步加强。离开学科发展,高校智库建设往往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践也证明,南大在国内外有良好声誉的智库都以强大的母体学科为依托。

南京大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拥有国家级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1 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2 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4 个,其他省部级研究机构 25 个,校级研究机构 99 个。研究机构众多也意味着存在专业领域细分化、决策研究“散兵游勇”化的现象,这影响了南京大学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整体发展水平。南京大学根据教育部“并非所有的高校科研机构都要变成智库,也不是所有的高校重点研究基地都变成智库。而是重点研究基地可能有一批要转型升级发展为专业化的智库,还有一批基地要发挥好智库功能,但并不要求向专业化的智库发展”的指示精神,提出重点建设江苏发展高层论坛、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风险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与和平学研究中心、长江产经研究院、江苏紫金传媒智库等国家急需、学科雄厚、团队力量强的研究机构,并促使它们向专业化智库转型。南京大学要求智库化建设的基地彰显现代智库的专业化:一是准确的功能定位,智库就是智库,不要过多承载其他非智库职能;二是明确的专业领域和方向,南大重点建设的智库都不是综合智库,都有明确的领域和方向,综合智库职能由南京大学整体承担;三是逐步形成的专业化的资政研究队伍;四是符合现代智库建设要求的治理结构、管理方式和运营模式。

陈骏校长指出在新型智库建设的时代课题中,“南京大学要以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己任,不断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大力推进原创科研,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南京大学以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目标,开展校内外协同创新,结出了丰硕成果。

2015年4月,南京大学在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正式组建了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该中心以信息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创新团队为核心,积极开展智库研究和平台建设,并为江苏省有关部门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一系列咨询服务工作。“中心”联合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的专家,集中力量攻关,开发的“中国智库索引”(CTTI)已经于2016年9月28日正式上线。除了系统开发外,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还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中心已经培养出一名智库研究方向的博士,另有在校的四名博士生都以智库研究和评价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对西方智库研究成果的译介是中心的重要工作,“南大智库文丛”首批三本图书就是我们团队的成果。

四

“南大智库文丛”是南京大学整个智库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战略性的安排。它将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坚持高品位、高质量、前瞻性、实践性的遴选标准,不仅汇聚南京大学的智库类出版物,而且面向全国、面向国际接纳一流的智库成果,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打造一个新的智库出版名牌。

“南大智库文丛”首批推出三本图书《完善智库管理:智库、“研究与倡导型”非政府组织及其资助者的实践指南》《思想的掇客:智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和《国会的理念:智库和美国外交政策》。其中《完善智库管理:智库、“研究与倡导型”非政府组织及其资助者的实践指南》是我们课题组去年推出的《经营智库》的2015年修订版,作者几乎改写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内容。雷蒙德博士是美国卡特政府时期的高官,也是世界著名智库华盛顿城市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雷蒙德博士近20年来一直从事智库管理的研究与咨询,是智库管理方面真正的权威。对于刚刚起步的新型智库建设,这种操作性实务性的书最为需要。引进现代智库管理经验,夯实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基础是我们翻译的初衷。我们也要衷心感谢雷蒙德博士,他极力劝说了该书的版权所有人——“华盛顿发展绩效研究所”无偿把版权授予了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

另外两本书都是美国智库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国会的理念》作者埃布尔森是北美智库研究的权威,是高产的智库研究专家,在这本书中,他选择了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布什政府打击恐怖主义两个政策案例,考察了几个精英智库是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他认为这种案例考察法是评估智库影响力的最审慎的研究方法。也许本书会启发我们进行智库评价评估的新思路。《思想的掳客》更多采用了政治史的研究方法,系统考察了华盛顿政策精英的崛起过程及其影响。该书对美国智库专家的六类划分已经被智库界广泛接受。这两本书必将加深我们对美国智库及其影响力的认知,对美国智库愈加了解,我们愈加知道美国政治运行的本质,我们愈知道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矣。

最后,我要感谢南京大学朱庆葆副书记、王月清教授,要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金鑫荣社长、薛志红副总编,没有他们的高瞻远瞩,“南大智库文丛”就不可能有诞生的这一天。我也要感谢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尚庆飞主任、汪桥红副主任,他们以历史的责任感推动了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 CTTI 项目的进程。我也衷心感谢光明日报的杜飞进总编、李春林副总编、李向军主任、王斯敏主编和她的智库团队。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得到了光明日报的鼎力支持,光明日报和南京大学就 CTTI 项目再一次开展了真诚的战略合作。当然,我要衷心感谢三本书的三个翻译团队,他们是来自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笔译硕士班朝气蓬勃的研究生。他们的勤奋、责任感和工作效率都让我惊奇,让我感动,让我自豪。

我不仅策划了文丛的选题,组织了翻译团队,而且通读、推敲了全部书稿,甚至重新翻译了个别章节。因此,成绩是团队的,不过书稿的错漏我难辞其咎。也请专家和业界同行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新版修改。

是为序!

李刚

2016 年 11 月 16 日

《思想的捐客》各章节译者

翻译章节	姓名
鸣谢、序言	高天舒
第 1 章、5 页索引	周 弦
第 2 章	张连闯
第 3 章、5 页索引	邱 云
第 4 章	卢诵典
第 5 章	王 爽
第 6 章	孔祥越
第 7 章	邹婧雅
第 8 章	赖雅兰
第 9 章	王 璟
第 10 章	贾秋橙
附录前 21 页、参考文献、6 页索引	尉艳华
附录后 20 页	房思佟

“二十世纪基金会”是美国最悠久的政策研究基金会之一。1979年,我刚到基金会时,就对它的初期历程(处于进步主义时期)和其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充满兴趣。当我还在那里工作时,就开始为本书的写作做准备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新型智库机构(指的是类似“传统基金会”那样的新保守主义智库)在华盛顿萌芽,美国的智库现象愈发值得研究。时任基金会主管的默里·J. 罗森特给予了我鼓励和支持,其他24所研究机构和慈善基金会的主席、主管和工作人员也都接受了采访,和我进行了正式或非正式的谈话。我总共采访了大概150人,因为名单过长,无法在此一一列出,但我将许多名字在书中的注释部分点明。最终证明,他们集体的智慧是无价的。

我的研究也得到了来自许多不同机构的图书管理员和档案管理员的帮助。基金会的档案既是了解政策研究机构的早期历史,也是研究社会科学和政策学的总体发展的最佳信息渠道之一。我希望在此感谢曾任福特基金会档案管理员的安·C. 纽霍尔,曾在卡内基公司担任秘书的萨拉·L. 恩格尔哈特,约瑟夫·W. 恩斯特、达尔文·斯坦普莱顿和我的朋友们,以及曾经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心工作的我的同事们——我曾于1988年到1989年间在那里担任常驻学者,也正是在那时我完成了本书的手稿,还有布鲁金斯学会档案馆的苏珊·A. 麦克格蕾丝、城市研究所的卡米尔·莫塔、二十世纪基金会的图书管理员、非正式档案管理员和口述历史学家内蒂·格尔达克。

我还要感谢那些为我提供了许多出版物和当代文件、回答我的问题、帮助我与他们的同事取得联系、为我们安排采访的人。我尤其希望感谢传统基金会的赫布·伯科威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戴维·阿布希尔和托马斯·布雷哈、加图研究所的戴

维·博阿兹、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帕特里克·福特、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法赫蒂和玛格丽特·罗德斯、胡佛研究所的朱莉·乔丹和格洛丽亚·沃克、哈德逊研究所的卡罗尔·卡恩、道德和公共政策中心的欧内斯特·勒菲弗、罗克福德研究所的约翰·霍华德和迈克尔·沃德尔、兰德公司的保罗·威克斯。同时，拉奇蒙特图书馆的洛娜·阿德勒和她能干的同事们为我处理了大量馆际互借的申请，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我还要感谢加雷斯·埃塞尔斯基和卡罗尔·曼这两位出版经纪人，他们将这本书交付到弗里出版社，一路上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

在成书的过程中，许多人阅读了全书手稿的初稿，并在终稿成型的过程中充当了听众。其中，二十世纪基金会的几位前任同事提供的帮助最有裨益：玛莎·扎格和罗伯特·T. 范彻孜孜不倦地对不同草稿提出了批评意见，而早些时候与卡罗尔·巴克、约翰·E. 布思和罗恩·切诺的谈话也对我大有启发。一些历史学家朋友，在阅读了初稿中的部分章节或是全部内容之后，给出了很多有用的评论。他们是 W. 安德鲁·阿恩鲍姆、爱德华·伯科威茨、斯坦利·卡茨、艾伦·拉格曼、凯瑟琳·D. 麦卡锡和詹姆斯·B. 派勒等。弗里出版社的编辑亚当·贝洛也跟我分享了他对政治顾问史的精辟见解。他不仅是值得我信赖的编辑和合作伙伴，也是我在研究智库时最专业的顾问。在他的指导下，我对政策专业知识和政治本身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温迪·奥尔梅莱一丝不苟地编辑加工了终稿。在此我也郑重做出声明，我并没有采纳其所有的建议。

除了专家们的建议之外，在写作过程中，我还私下专门从妻子瓦莱丽那里得到了更为宝贵的建议，我的父母也为我提供了巨大支持，谨以此书献给他们。

在参观巴尔尼巴比的拉格多大科学院时,格列佛认为教授们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他对此感到困惑,认为这许许多多的构想根本就是异想天开——无论是从黄瓜里提取阳光,从屋顶开始自上而下地建造房子,训练猪来耕地,还是别的什么。然而无论这千奇百怪的计划是多么大胆,这些设计家们(他这样定义那些科学家)又是多么具有独创性。在他参观科学院的过程中,总有些东西在困扰着他,而这些东西正是这些专家和他们的想法从根本上就缺少的。

格列佛在政治设计家学院变得尤其怅惘:

这些郁郁寡欢的人(至少在格列佛看来)正在那儿提出他们的构想,他们想劝说君主根据智慧、才能和德行来选择宠臣,想教大臣们学会考虑公众的利益,想对建立功勋、才能出众、贡献杰出的人做出奖励,想知道君王们把自己真正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放在同一基础上加以认识,想选拔有资格能胜任的人到有关岗位工作,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一些狂妄而无法实现的怪念头,都是人们以前从未想过的。这倒使我更加相信起一句老话来:无论事情多么夸张悖理,总有一些哲学家要坚持认为它是真理。^①

^① 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726年,1974年再版,第226页。(译者注:此处关于《格列佛游记》的内容参考了杨昊成先生的中译本。[英]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杨昊成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2009年3月第20次印刷,第160页。)

对于乔纳森·斯威夫特笔下的格列佛来说,拆穿拉格多的科学家们所提出的种种更为奇异的设想并不是件难事,但是他却不曾真正解释过自己惆怅的来由,尤其是当他与那些政治专家相处时。毕竟他们的想法并不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他是因为教授们关于改革的构想而感到悲伤吗?毕竟那些构想无论是愚蠢还是合理,从根本上讲都是不切实际的。是因为社会问题过于棘手,而政府显然对合理、科学的社会改良方式置之不理,抑或是因为政治领袖无法将道德真理和科学知识付诸实践?乔纳森·斯威夫特既是政治檄文的起草者,又是为辉格党和托利党服务的教士,具有着谦逊等优秀品质,对于他来说,如何将知识和权力联结起来,这一问题不仅关乎理论,也关乎现实的政治抱负。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及其各式各样的学会始终是乌托邦主义者设想的主题,而有学识的政策顾问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政治史、传记和治国理政丛书等的中心议题。然而,现代政策专家和他们的研究机构所受到的关注就要少上许多,因为它们已不再是新奇的发明,而成了政治生活司空见惯的基本特征。事实上,这些机构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比拉格多大科学院明确,为其效力的专家亦然。^①

有时,由当代政策研究机构提出的构想和愿景似乎非常不切实际:它们虽然不像拉格多科学院的“奇思妙想”那般滑稽,但在政治上却是难以实现的,或者说是晦涩难懂的。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勤恳地从事研究,并在过程中征询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然而,参观当代政策中心和机构的人可能会比格列佛还要失望。即便我们对格列佛早在几百年前就观察到的知识和政治之间的鸿沟再熟悉不过,然而一旦想起这一点,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感到怅惘(这一古老的词语恰能准确地描述这种情绪)。这种情绪还在不断地加强,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20世纪以来,社会就投入了大量的财政和智力资源,用于有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和专家咨询机构的建设中,但这

^① 关于过去三千年的政治咨询类文献的一项有趣的调查,请参见赫伯特·高德海姆:《顾问》,纽约:爱思唯尔,1978年。